

編輯室報告

本期的語文教育專題「語文教學之癥結與出路」，借用了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陸儉明教授的文章題目。2005年11月陸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，擔任「王澤森——新法書院語文教育訪問教授」，這篇文章是他其中一次公開演講的講詞，本刊得到陸教授允許在此登載，讓沒有出席的讀者有機會了解陸教授對語文教育問題的宏觀研判。

陸教授提出了四個走出語文教學困境的策略：一、重新為語文教育定位；二、選用課文時考慮學生的特點和需求；三、改變講解課文的套路，引發學生的興趣；四、改變應試教育的路子。這些都是正本清源之論，我們認為第四點尤其重要。為考試而讀書、「高分低能」一直是本地教育界，以至社會輿論長期抨擊的現象。怎樣才能糾正以考試為目標的施教與學習？陸教授提出兩項具體建議，一是取消考試大綱，二是增加主觀題，減少客觀題。他認為香港地方範圍小、考生人數也少，可以在高考試題改革上先走一步，為內地提供經驗。這兩項建議本地教育界的討論似乎還不算很多，我們期待更多專家學者來稿分享他們的看法。

我們明白，公開考試作為主要的人才分流機制，足以影響學生將來所能達到的社會層級，這一點如果不改變，學習就只能永遠跟著考試走。香港近年迫切希望轉型為知識經濟，持續進修、終身學習逐漸成為共識。但我們仍得考慮，僱主要求的各種進修證書，與僱員職業所需的知識，究竟構成怎樣的關係？高考「一試定生死」的殺傷力究竟是消滅了，還是在各種較小的範圍裡滋長出更多換了名字的「高考」？因此，高考試題改革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知識如何認證的問題。法國社會科學家布赫迪厄(Pierre Bourdieu)曾批評唯生產力、競爭力是尚的新自由主義，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。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中一個惡果，是破壞了職業的穩定性，它的影響已從體力勞動者廣泛擴展到中產階級。不難看出，持續進修要是淪為證書主導、應試教育，其實不過是製造失業威脅，以作為控制員工的手段。由高考試題改革說到社會政策，似乎遠遠超出了本刊範圍，但把語文問題放在較大的脈絡上觀察，或許看得更深刻，讀者當能判斷。